

方冠男 著

戏剧文化的 历史书写

XIJU WENHUA DE LISHI SHUXI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戏剧文化的 历史书写

XIJU WENHUA DE LISHI SHUXIE

方冠男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剧文化的历史书写 / 方冠男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482-3654-2

I. ①戏… II. ①方… III. ①戏剧史—研究—世界
IV. ①J8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92302号

策划编辑: 陈 曦

责任编辑: 孙小林

装帧设计: 刘 雨

戏剧文化的 历史书写

XIJU WENHUA DE LISHI SHUXIE

方冠男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理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95千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654-2

定 价: 42.50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65031070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目 录

中国话剧的历史书写	001
改造·创业·零余·被改造：曹禺作品中归国留学生的 形象书写	002
新时期“国剧运动”研究现状概评	022
当代中国内地戏剧研究经略	053
洪深·“爱美剧”·娜拉：1924年《少奶奶的扇子》的 三重历史观察	089
文明戏的1920年突围：对《华伦》事件的双重坐标考查	108
认知“自我”与迷失“自我”：中国舞台·外国导演	131
从彼岸想象走向珠联璧合：内地话剧·香港书写	155
戏剧文化书写	179
审判戏剧：法制基因与现代刺激	180
戏剧与国家意志的历史书写	210
关索戏：仪式与宗法的双重秩序	237

好女人·坏女人：传统戏曲婚姻情节中的女性	251
富贵的弱者，有限的反抗：《西厢记》中的女性图景及其社会想象	276
齐如山：一桩引人深思的研究个案	296
云南戏剧历史与文化	325
昆明城市话剧地图	326
大剧院与庭院潮：并未拓展的演剧空间 ——昆明城市话剧地图续编	356
关肃霜民族题材现代戏之管窥	373
《黛诺》：人格·国家·文化的三重构建	400

中国话剧的历史书写

改造·创业·零余·被改造：曹禺 作品中归国留学生的形象书写

导读：经过对曹禺话剧作品《雷雨》《日出》《北京人》《明朗的天》中留学生形象的梳理，再结合1915年张彭春的戏剧作品《醒》，可以归拢出来的逻辑是：第一，留学生的形象，经历了从创业者到零余者的身份置换；第二，留学生的形象，经历了从改造者走向被改造者的地位转变。由此可见，这样的双重身份转变，渗透的是社会层面对留学生群体的想象变化，其内在逻辑，指向的是中国留学潮的退潮趋势，在这样的退潮趋势中，可见的是，中国民族自尊的重建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今天，当中国再度兴起留学潮的时候，本研究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留学生群体是一股元气十足的力量，他们在中国极为艰难的时刻，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带来了西方先进的革命思想，也促进了戏剧新文化的新陈代谢。正是因此，留学生们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支重要群体，他们学养扎实，也常怀经国大志，同时，他们也处于东西方文化冲击、现实和理想碰撞的焦点——他们对自己形象的定位，常常是丰富而充满意味的。因此，在胡适、欧阳予倩、张彭春、洪深、熊佛西……的作品中，留学生常常以一种自况、自我观察的面貌出现。

这样的留学生书写，形成了现代中国对留学生的一种想象。但是，假如只以留学生自我观照的视角来观察的话，这种想象并不完整，因为自我观照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要够完整、够全面，须得再有他人观照的视角。

如果说，要找出一位观察力、判断力、总结力俱佳的“他人”来，我想，曹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归国留学生：四代形象梳理

作为中国现代剧作家中为数不多的没有留过洋但又受过留学生影响，同时贡献卓著的剧作家，曹禺既是旁观者，也是影响接受者。相对于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观照，他眼中的留学生形象如何，反因远观，而显现出较为客观、较为准确的面貌。也因曹禺

的远观，我们才能在他的想象中，看到社会大众视域和历史流变中的留学生面貌。

（一）《醒》：前代归国留学生

当留学生还未进入大众视域的时候，留学生的自我定位就成为大众眼中留学生的形象基础了。因此，我们称其为前代留学生。

张彭春的剧本《醒》，塑造了这类留学生的形象。《醒》本为英文剧本，创作于1915年的纽约，其时，张彭春正于美国求学。《醒》中塑造了四位留学生角色，一为卢先生，一为冯先生，一为冯先生之妹，一为林国维。值得注意的是，卢、冯及冯妹三人是留美的归国学生，而林国维则是留日的归国学生。情节为：留美学生卢回国，与冯氏兄妹相聚，方知中国不似自己想象那般。留日学生林来拜访，其行更显其人格卑下。最后，冯先生因查处贪污罪行，而被人暗杀，但他的死激励了卢与冯妹。在这样的戏剧情境当中，张彭春是这样定位前代留学生的：“对于这个世界，我索取的太多，付出的太少了。当他（冯）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时，他显得特别严肃。我清楚地记得在他最后的遗言中，他曾经说过：‘改变人们的思想，创造你的新种族，这是光明未来的唯一牢固基础。’我将从教育婴幼儿做起，抚育他们成长，使他们成为具有新体质、新思想、新灵魂，不辜负我们伟大

祖国的光荣历史的男男女女。”^① 这既是作品中的情感升华，也是作为道义一方的张彭春的自况，更是他对与自己一代的留学生的期许。

值得注意的是，张彭春的《醒》中，在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意志博弈方面，留美学生强过留日学生，也正直过留日学生。这期间可以看出，中、日、美三国的微妙关系。需要指明的是，这样的剧情表现，与张彭春的留美背景相关。1910年，中美启动庚款留学的项目，张彭春作为第一代庚款留学生，被派遣到美国，学习教育学、文学。与张彭春同批的留学生还有胡适、赵元任等人。这些庚款留学生，在美国接受美国的教育，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美国思维、习惯、价值观的影响。因此，这一代留学生归国，为中国带来的文化、政治、民主的范本，就是美国模式。

因此，这一批前代留学生，大多以富于美国精神的民主斗士的形象为自我期许，也胸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改变中国、改变民族的现状——这形成了曹禺对留学生观照之前的形象底色。

（二）周朴园：初代归国留学生

在这形象底色上，再来观照曹禺笔下的留学生，就可看出自

^① 黄殿祺主编：《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我观照与他者观照的不同。

在曹禺的《雷雨》一剧中，最初的留学生，应是周朴园。其实，周朴园的形象原型，要比张彭春更早，不妨称其为初代留学生。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著名形象，早年留德，归国后，曾有过些新思想，在社会丛林世界的博弈中，渐渐适应社会，成为丛林世界中的上层人。最终，定型成为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工厂的资本家”形象。

周朴园的形象从何而来？我想，原型应是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根据《曹禺评传》的记录，在洋务运动时期，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接受官派留洋。1904年，抵达日本，求学于振武学校，之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万德尊回国。回国之后，一面是军阀混战、时局不佳；另一面是万德尊仍有文人习气。因此，虽身居高位，但仍常怀对现世的不满。黎元洪垮台之后，万德尊赋闲在家——“性情乖戾、精神颓唐”^①。如万德尊那样，这批清政府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而派遣出的留学生，到头来居然变成了旧时代的“寓公”、旧家庭的家长。他们的生命，也曾经充满元气，也曾经希望创造新生，但在时代的频繁变换中，元气与希望渐渐暗淡。终于，他们跟着旧的王朝一同衰败下去了，这虽然可惜，但确乎是那一代人的写照。

^① 田本相、刘一军著：《曹禺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全面观照中国真正的初代留学生如何，有什么特点，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基于万德尊原型的周朴园，确实是曹禺笔下、曹禺眼中的初代留学生形象，他们是最早出国学习的留学生，也是最早归国，努力创业，取得“成功”的一群。但是，他们取得成功的过程，恰是他们丢失青年锐气，将元气抛诸脑后的过程。最终，当他们取得成功的时候，早已失去了“留学生”这样的先进标签，而变成权威的家长、“丛林的君王”了。

这与张彭春这批庚款留学生的自况，显然是大不相同的。

（三）张乔治与江泰：中代归国留学生

如果说《雷雨》中的周朴园，是曹禺笔下的初代留学生，那么，《日出》中的张乔治、《北京人》中的江泰，则是曹禺笔下的中代留学生。

之所以说中代，一则，自然是基于角色的情境年龄，张乔治在《日出》中的出场，正是三十一岁，江泰在《北京人》中的出场，则为三十七岁，《日出》（1935年）与《北京人》（1940年）的创作时间，也正好相隔了五年，大略估算，张乔治与江泰，基本是一代留学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正好是中年一代；再则，根据《日出》和《北京人》的写作时间，张乔治和江泰的留学时间大略是1920年至1930年之间，这个时期，中国已然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此期留学生，不早不晚，越过了中国最艰难的时刻，留学时段不再是留学知识基础打得最扎实的时

段，他们绝不是初代、前代的探路者，而已经是轻车熟路的跟随者了，故可称其为中代归国留学生。

曹禺笔下的中代归国留学生，张乔治也好，江泰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无成，而用曹禺剧中的文辞，即“讨厌的废物”。

《日出》中，张乔治的出场，有点漫画式的感觉，他摇摇晃晃、醉态蹒跚、满口胡话，而在陈白露的眼里，他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科长，现在口袋里很有几个钱”；而《北京人》中的江泰，则是“姑老爷江泰是个专攻‘化学’的老留学生，到了北平，就纵情欢乐，尽量享受北平舒适的生活，几乎和北平土生的公子哥儿的神奇，毫无二致”，“回国后，颇想大大发展一下。他不知为什么抛弃本行，洋洋自喜地做了官。做了几次官都不十分得意，在最后一任里，他拉下很大的亏空，并且据说有侵吞公款的嫌疑，非常不名誉地下了任。他没剩多少钱，就和太太寄居在丈人家，成天牢骚满腹，喝了两杯酒就在丈人家使气”。

假如我们对照两个角色来看，不难发现，三十一岁的张乔治就是尚未潦倒的江泰，而三十七岁的江泰就是亏空失败了的张乔治，六年后，张乔治很可能就会变成江泰。这两个角色，表现的是一种人的不同时期，这种人，即曹禺眼中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归国留学生。

如前所言，这时期的归国留学生，不再如初代留学生那样要肩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任，也不再如前代留学生那样拥有

改变中国、改变民众的宏图伟志，他们大多出身优越，为谋前程，寻得学历，从而选择留洋镀金，归国后，安排做官从政，但又因胸无大志，只会享受，不会守成（中旅唐槐秋即为此类），于是，要么就是花花公子如张乔治，要么就是落难女婿如江泰。事实上，对于这个时期的自费留学生热潮，有研究认为，“自费生因资格限制既宽，又不需经过考试，所以资格与学习科目均成问题”，“在年龄上与学力上均不能至国外研究学术，时间与金钱既不经济，而使髫龄童子熏染于外国教化之下，于国家前途亦无裨益”^①。

曹禺对此类留学生如张乔治、江泰的描述，正是舒新城先生所研究认定的自费留美生的一种普遍写照。

（四）《明朗的天》：末代归国留学生

之所以会说到“末代”二字，全是因曹禺笔下的留学生群体中，这一人群是他最后涉及的一批留学生。因此，是曹禺笔下的“末代”，也是其时代的“末代”，但未必真是中国留学生的“末代”。

这一批末代归国留学生，以曹禺《明朗的天》中的群体形象为主。凌士湘、宋洁方、江道宗、陈洪友，这些形象是《明朗的天》中树立出的，国民政府末代归国留学生的形象，也是曹禺本

^① 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人深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调查三个月后的所得——他们各有形象、各有立场、各有阵营，在江山易代的背景下，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来。

首先是宋洁方。她是末代归国留学生中与进步阵营走得最近的一位，也是在1949年之后，迅速融入“新时代”的一位。一开始，她就表现出了关怀人民的品质，也曾秘密救助过共产党员。她正直、进步，是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其次，凌士湘。作为最纯粹的科学家，他完成了一次成长史。最初，凌士湘眼里的科学研究，是不分国界的，但直至最后，他才发现，科学虽然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科学成果的运用主体有国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促进医学进步，但也可能成为战争的帮凶。这一层认知，使他跳脱出了疯魔科学家的小世界，而走向了关怀国家民族的大格局。

而江道宗，则是剧中塑造出来的反面形象。在重建国家、救死扶伤的关口，注重个人得失，这一类知识分子甚至充满了对人民新政权的不信任，最后，不惜走上了通敌卖国的道路。至于陈洪友，则属于老实忠厚乃至在大是大非面前，失去判断力，也没有判断力的类型。

其实，如果结合曹禺笔下归国留学生的群体形象，我们会发现，江道宗身上，或多或少有周朴园的影子，陈洪友的身上，多少也有些张乔治、江泰的影子，而新的形象，应属凌士湘、宋洁方二人。但也要注意，这两个形象的来源，与周朴园、江泰等角

色不同，周、张、江这些形象，源于曹禺生活中的观察、接触、思考，是曹禺熟悉的形象，但凌、宋二人，是曹禺在新政权背景下的主动追求，换言之，这是一种“表态”，表态的内容是，在新中国明朗的天空下，留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迎来了一次新生和改造，接受改造的，走向明朗的世界，而不接受改造的，则将接受人民的审判，迎接自己的覆灭。

因此，旧时代的末代留学生，接受了改造之后，就成了新中国的初代留学生了。不妨再联系到张彭春所塑造的归国留学生形象，从那时的改造社会者，变成《明朗的天》中的被改造者，从民众领导者的定位，走向民众服务者的定位，我们分明看到的是，留学生形象在历史变化中想象的显影。

二、形象中的想象

那么，想象的显影是如何体现的？梳理了曹禺时代四代归国留学生的形象之后，我们不妨对这些形象进行一个归纳，他们分别是创业者（周朴园）、“零余者”（江泰等）、改造者（卢先生等）、被改造者（凌士湘等）的形象。

（一）从创业者走向“零余者”

初代留学生归国，如周朴园，经历了中国商海的沉浮、丛林社会的博弈，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他终于得到了相

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从某种程度来说，周朴园，是那个时代的一类创业者。

而江泰则不同。归国之后，他放弃本专业（化学），迅速进入中国的宦海，结果仕途不顺，左右都不如意，丢官之后，更是高不成低不就，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做不了，其实，正是一个“零余者”的形象。

“零余者”的形象，最初来自于郁达夫的小说。有意味的是，郁达夫也是一位留学生，1913年他留学日本，之后创作了一大批小说，在他的小说中，集中体现了一类留学生的人格——“零余者”，即消沉卑微又心有不甘，在日本受人冷眼，（《沉沦》）在中国又难以成事。（《春风沉醉的晚上》）留学的苦楚与归来的无成，在“零余者”身上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而江泰也是这样的一类“零余者”。

那么，当曹禺的笔法，从创业者周朴园转向零余者江泰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说明的是，留学生群体地位的下降。中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有赴外留学生，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其时，正是西方虎狼窥伺中华的时期，也是列强强势、中国弱勢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往强势国家，携带着强势国家文化、技术、逻辑归来的留学生，也俨然成为高一等的人才。加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等人从美国归来，带来了文化“进化论”的思维，认为西方的是先进的、中国的是落后的，